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整合与创新

第二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胡庚申 主编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整合与创新

第二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
交流研讨会论文集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主 编 胡庚申
副主编 毛思慧 崔维孝
编 委 林子予 蒋晓华 李 丽
林 巍 孔 昊 列建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跨文化交流:整合与创新/胡庚申主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ISBN 978-7-5446-1152-7

I. 翻… II. 胡… III. 翻译-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5383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陶 怡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27.75 字数 44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152-7 / Z · 0015

定 价: 41.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译学新视野 译论新观点

——第二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 跨文化交流研讨会综述*

(代前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四地”的交流与合作持续发展,根据首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的决议,经澳门理工学院理事会批准,由澳门理工学院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办、台湾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和北京清华大学外语系协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于2007年11月22—24日在澳门理工学院召开。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整合与创新。具体议题包括:(1)翻译理论研究与创新思维;(2)翻译、跨文化与跨学科研究;(3)社会、文化、交际、语言与翻译生态环境;(4)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研究;(5)口译、笔译教学研究;(6)海峡“两岸四地”翻译行业的现状与发展;(7)海峡“两岸四地”翻译理论界交流合作的前景与趋势等。

本次研讨会秉承本会“小规模、高层次、重理论”的学术定位,聚集了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翻译学界的知名学者50余人。研讨会采取“报告”和“评论”相结合的方式。从本次会议主题、与会学者、研讨形式、学术氛围以及会议安排等方面来看,本次研讨会是在首届会议成功召开的基础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理论与跨文化交流研究领域里又一次较高层次、较高水平的会议。“两岸四地”知名学者云集,与会者中博士、正副教授占98%以上。

会议期间,与会者们以“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的整合与创新”为主题,展示新译论,交流新成果,阐述新观点,拓展新视野。加之与会专家学者的点评,或高度概括,或画龙点睛,或借题发挥,或批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既“升华”了相关的研究论文,又令与会的听众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 该会议综述的简写本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年第3期,第195页。

现拟对本届会议的译学新视野、译论新观点、译事新进展等给予综述,期能将“两岸四地”与会者的新论、高见、博学、雄辩等与大家分享,以飨读者。

一、译学新视野

翻译学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也成为本次会议的显著特点之一。

中国海洋大学杨自俭教授以《论翻译学的学科结构系统》为题探讨了翻译学研究的结构究竟应该如何划分这一问题。杨教授首先介绍了等级层次原理,指出了结构划分应该遵循的基本模式和定律。以此为基础,他系统地回顾了中西方译学界曾有过的学科结构系统划分,并指出各个系统对翻译学的贡献及存在的缺陷和逻辑上的矛盾。杨教授还介绍了自己对于学科结构系统划分的一些思考。他认为翻译学的学科有广狭两个系统,前者为学科制度系统,后者是学科规范体系。后者的划分处于学界对话的中心地位。2005年杨教授所提出的由微观技术研究、中观描述性研究、宏观理论研究、翻译哲学四个层次构成的翻译学科规范体系是较早期的尝试。经过两年的论证和思考,这一系统划分得以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杨教授以其抽象程度高低以及距离实践远近为标准进一步将学科规范体系划分为元理论、翻译哲学、译学理论、策略选择、方法技巧五个子系统。

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以《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为题进行演讲。他首先陈述了近年来国内译界围绕翻译研究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这些观点对近几十年来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的译学观点几乎全部予以否定,认为语言学派的理论偏向导致对翻译现象的误释,对翻译理论学科的消解,而翻译的文化研究则无限扩大翻译研究对象的外延,使其学术边界模糊。这种种的诘难源于对翻译研究中翻译的本体与翻译学的本体这一对基本概念的混淆。翻译的本体绝不等同于翻译研究的本体,对回归翻译本体的强调实质就是否认翻译的主体性,否认翻译学学科的独立性。要建设独立的翻译学学科就必须首先把翻译学从外语翻译教学课堂中解放出来建设独立的翻译学学科。

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以《从“关联序链”看译学研究视野的“生态转向”》为题探讨了翻译学研究视野的转向问题。当西方译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文化转向”后,过去的十余年中翻译学界似乎陷入了后现

代的迷惘之中,其理论活跃程度明显降低。胡教授以“翻译”到“自然界”的内在的、人类认知视野衍展的“关联序链”(即:“翻译→语言→文化→人类→自然界”)为立论基点,提出翻译研究视角在经过“语言转向”、“文化转向”之后将会出现“生态转向”的学术命题。他认为,值此全球性生态取向的大趋势,译学研究视野的“生态转向”是由外部世界诱发的,而以往译界(Newmark 1988, Katan 1999, Cronin 2003 等)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了“生态转向”,并由过去几年中国学者的“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所实践。展望未来,翻译学研究视野的“生态转向”能够有助于克服“后现代”的“迷思”和“后现代”之后的“困顿”,有助于回归中华文化“重整体”、“讲和谐”的生态理念,也“有助于彰显东方学者译论之声”,更能“有助于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刻板的界线”。

南京大学许钧教授作为大会发言的评论人,对三位教授的讲演做了精辟练达的点评。他认为,杨自俭教授是充满逻辑性地对翻译研究的五个方面进行了层次性的概括;谢天振教授是充满智慧地把翻译的本体与翻译研究的本体作了非常深刻的剖析并指出了方向;胡庚申教授则是富于前瞻性地预测了翻译学研究视野的下一个转向,其中既有对于过往翻译学研究的思考,也有目前对于翻译研究走向何处、对于“后现代”之后的迷思和困惑的回答。

许钧教授评论之后,又以《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作了发言。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由于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日益增多,语言的冲突成了国际事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语言之间的关系开始超越语言和文化的层面,对国家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起着重要作用。从理论上讲,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语言的多元是其基础。而要维护语言的多元,翻译是最有效的手段。翻译不仅仅是跨越语言障碍,实现跨文化交际的人类实践,更是促进国际交流,实现人类文明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许教授呼吁,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翻译研究要注意从语言关系入手,从维护文化多样性着眼,开阔视野,从语言、文化的层面进入思想层面的深度思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大会发言的题目是《论翻译的整合性》。他认为,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但这种转换不是公式化的,而是调整性的,即整合。翻译整合的若干方面具体包括语言表达方式的整合、文化习俗表述的整合,以及不同文体的整合程度等。王教授指出,翻译就是跨语言、跨文化的整合,就是内在、外在因素的整合,就是宏观、中观、微观思维

的整合,就是原文、译者、译文的整合。一句话,就是将语言、文化等整体资源优化,使其价值最大化——达到超值!最后,王教授还特别提出了翻译整合的要点:一是要强调翻译主体行为;二是在表现上,翻译的整合拟呈现出“文化习俗>表达方式>文体特性”的顺序。本文综述者认为,王教授的“整合论”是从中华文化视角对翻译行为最好的诠释,既有理论概括力,又切合翻译实际,当然也与本次会议“整合与创新”的主题吻合一致。

香港浸会大学谭载喜教授以《翻译相对论与第三形态》作了大会发言。他认为,翻译的形成条件之一,是目标文本必须与源文本“对等”,但“对等”程度和表现形式却不可用绝对尺度来衡量。谭教授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翻译以及翻译中文化身份建构的相对性展开讨论。他指出,由于相对性规则的作用,翻译作品以及该作品代表的文化身份,其地位都是相对独立的;译品及相关身份既像源语又像目标语,但它们既不属于源语也不属于目标语,而是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形态,即“第三形态”。这是翻译的本质所在,也是翻译行为的目标所在。

香港岭南大学孙艺风教授用中英两种语言宣读了论文《文化翻译及变异范式》,重点探讨同一个语义范围内不同译法的各种可能性及可行性问题。他认为,文化翻译的过程意义充满了内在的不确定性,因而引致同构型和异质性不断相互作用。翻译变异理论的意义在于,其探索性和实验性有助于提高对文化差异和语言及文化的制约,以及对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之间的兼容或不兼容的语域特征的意识。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的语境的变化以及认知和审美的差异,翻译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形式亦变化无穷,翻译的“改写”空间和性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关注翻译变异范式则可提供一个超越性的向度和迥异的研究视角。

当代哲学的关注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主要做法是以现代视角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对其予以重新认识,梳理总结其主要特点,设法弃其所短,扬其所长,同时吸收西方哲学的有益成分,推进中国哲学直至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翻译学同样以哲学为其思想基础,中国现代哲学也同样可以成为翻译学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对尚处于理论输入阶段的翻译学来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杨晓荣教授在其论文《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反极端倾向及其在翻译批评理论中的反映》中对此作了探讨。她认为,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和思想方

法特点的分析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翻译界的研究习惯及其对西方翻译理论的接受状况。而哲学界提出的对中国传统哲学优缺点的扬弃主张也有助于引导翻译批评理论进一步理清其发展方向。

北京师范大学孟凡君博士后研究员在其论文中提出了《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新转向略论》问题。他认为,从译学史的角度而言,翻译研究范式的推演,实际体现了人类对翻译活动审视视角的变换。以往国际翻译研究的基本理路,正是沿着“翻译→语言→文化→人类活动→自然界”(Hu Gengshen 2003)的认知阈限次第拓展:从就翻译论翻译的经验性宣示,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沿着“翻译→语言→文化”的认知阈限次第拓展的,体现了翻译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不难看出,以往国际翻译研究范式的历时性推演,与人类对翻译活动的认知阈限存在着明显的对应。根本性的问题在于,在所谓后现代之后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应该转向何处?古人云:“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孟博士在对以往国际翻译研究范式的演变与人类对翻译活动的认知阈限的对应研究之后指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国际译界所面临的将是翻译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和自然生态学转向。

二、译论新观点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那场“直译一意译”、“异化一归化”的论争对当代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译界对“异化一归化”与“文化他者”的关系仍缺乏清晰的梳理。澳门理工学院毛思慧教授在《寻找译学研究“文化他者”的第三空间:重读贝尔曼、韦努蒂及鲁宾逊》的发言中,力图从后殖民文化翻译研究的视角,重读贝尔曼、韦努蒂及鲁宾逊等翻译理论家关于异化的不同理论和主张,具体探讨了在我们当代译学研究中寻找并建立“文化他者”第三空间的理论基础与路径。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外语系贺显斌博士则对《韦努蒂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误读》提出己见。他认为,国内不少翻译学者认为,“异化/归化”概念源自韦努蒂的“foreignizing/domesticating”; foreignizing 是原语取向, domesticating 则是译语取向;“直译/意译”是语言处理方法,而 foreignizing /domesticating 是文化移植手段; foreignizing 更忠实于原文。而这些观点其实都是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误读。贺博士认为,

foreignizing 与“异化”有相似之处,但在题材的选择原则、体现异质性的方式和希望达到的目的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foreignizing 作为一种在特定文化语境下肩负特殊使命的翻译方法,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但不可能得到全球译者的普遍认同,也不会成为未来翻译的发展趋势。本文综述者认为,贺显斌博士对“异化/归化”概念来源的梳理和正本清源,一扫目前学界一味接受不加反思的风气,可以为我们对有关概念的重新认识产生推动作用。

对韦努蒂和鲁迅的异化翻译观的“异同”,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进行了比较。他指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观与鲁迅的异化翻译观,在几个关键特征上十分相似乃至相同,主要表现在两者皆视精英读者为异化翻译的目标读者群、视古语为异化表现、视选材为异化翻译的重要环节、视翻译为一种政治和文化行为。王教授认为他们的不同点也很突出,鲁迅的政治目的是保种救国,即自强,而韦努蒂异化翻译的政治目的则是要抵抗英美的政治、文化和语言霸权,即自抑。鲁迅的异化翻译的另一个目的是要改良目标语言,但韦努蒂对于改良英语则不太关心。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利沙教授论述了应用翻译学系统理论范畴化的社会学基础问题。他认为,翻译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样遵循人类活动的行为模式:行为→动机→目的→需求,即翻译行为背后必有其特定动机,而动机背后必有其特定目的,目的背后又必有其特定需求。曾教授提出了应用翻译理论原则范畴化的建构,并从应用文本翻译研究入手,就目的一需求原则、价值原则、策略原则、辅助性准则与推衍机制及其内在逻辑联系进行了论述,即原则理论的范畴化,各范畴之间具有互为补充、相互关联、互为印证的统一性。

“张力”(tension)这一概念来自物理学,指受到牵拉的物体中任一接口两侧存在的相互作用的拉力。张力不是单向的,是两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天津师范大学李运兴教授提出了现代翻译研究中的“张力”问题。翻译研究发展中的张力,可称为语境张力。李教授分析了语言学派、德国功能主义、多元系统理论/描写翻译研究、翻译研究派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语境张力,指出了现代翻译研究发展的动力是语境张力。他认为,以语言学派和文化派为主的各种途径发生越来越多的互动和融合,相互改变对方,挑战对方,促进对方,最终形成一个为大多数翻译学者认同的一统的翻译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翻译理论研究的主客二分模式将译者及译文看成是翻译

的客体,原作者及原文看成是翻译的主体。这一以“原语中心论”为标准的划分,不仅遮蔽了译者主体性的地位,而且影响了人们对“忠实”标准的判断。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性也进一步得到凸显。但是,在译者主体性觉醒的过程中,主体间性中译者与文本的关系通常呈现为译者是主体,文本是客体。翻译是主客关系,也就是“我”—“它”关系,这样无形中产生了主客间的阻隔。主体间性提倡的是不同的主体之间的交往应该采取一种平等、自由的对话,只有这样翻译实践中才能消除不可通约的难题,以找出翻译中相对客观的标准、衡量方法和价值观。有鉴于此,武汉大学刘军平教授通过再思翻译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提出了“从主客二分到视角共享”的新思路。

河南大学蔡新乐教授在《自我翻译:行走在翻译“间性”之上的思想家苏格拉底简论》的发言中,通过对柏拉图的《会饮篇》以及色诺芬的同名对话录的解读,依照黑格尔的有关观点,提出苏格拉底的有关翻译观念预示了后世的“间性”思路,这位自称“中间人”的思想家其哲学活动首先是一种自我翻译,即自我认可和内在对话。主张个体性和随机性的自我翻译,与目前盛行的语言翻译概念截然不同。蔡教授还提出,有必要像苏格拉底那样回到人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触及翻译的源头。因此,将西方翻译史的开端定位于罗马时代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那正好就是基督教开始盛行、进而“普世”的时期。

用“非线性”思想看待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兴起的研究范式。最近的研究表明,在自然、社会、思维中更为普遍存在的是非线性。基于此,东北师范大学宋志平教授论述了翻译选择过程的非线性问题。他认为,翻译活动涉及的种种因素表明复杂的非线性特征才是翻译选择过程的根本性质。翻译活动的非线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选择与顺应双向性;选择结果的不可预测性;具体选择与译文整体效果的不对应性;选择过程的不可逆性;选择的不确定性等。宋教授认为,既然翻译研究对象是个多因素的复杂多变的系统,牵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时空、原作者和译文读者的不在场等,所以不应该只研究某些单个的因素,而应该强调研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研究这样复杂多变的大系统恐怕不能只用过去习惯了的原则和方法,而应该探讨新的思路与途径。本文综述者认为,宋志平教授的研究,展现了“后现代”之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一致的一个走向,而他关于理论

创新思维的见解也具有某些原创的特色。

语际翻译是一种跨越时空、跨越异质文化的交际活动。由于时空距离的存在以及异质文化在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方面的障碍,原文转换成译文时,其文本所传递的文化信息在进入译文文本所展现的文化场时必然会经过该文化场的过滤而发生一定变形。华中师范大学华先发教授称这种现象为“文化过滤”,并对翻译中的“文化过滤”现象进行了系统探讨。他认为,文化过滤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误读、过度诠释、欠额诠释、选择性翻译等。讨论文化过滤现象不应仅限于分析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同时还应研究其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作用。文化过滤对于译入语文化既有其积极的作用,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后果,对于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我们应该从历史客观的角度去认真加以研究和评估。此外,华教授还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这对“文化转向”之后理论视野的扩展,也可能产生一定的意义。

福建师范大学刘亚猛教授对“东学西渐”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东学西渐”的倡议者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文化影响只有通过一个极其复杂、涉及各种地缘因素的跨文化交流过程才能实现。事实上,任何文化产品,如果想在某个外异体系站住脚、扎下根,产生深远影响,就非经过一种“双重翻译”不可:首先译入对方语言,其次译入对方话语。译入对方语言尚且可以越俎代庖,由源文化成员自己完成,译入对方话语主要就得靠目标读者自己采取主动,“送去主义”在后面这一环节基本上不起作用。西学之所以长期“东渐”,产生深远重大的效果,恰恰是因为国人自己积极主动地实行“拿来主义”,而对方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采取势必造成强加于人印象的“送去主义”。刘教授预言,真正“东学西渐”局面的形成,恐怕要等到西方主动而且大规模地对中国的文化、智力作品进行上述“双重翻译”之后才能出现。

澳门理工学院蒋骁华博士谈论了“东方主义”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具体谈到了“东方主义”对翻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于对中国(古代)作品的翻译中所体现出来的“丑化”、“美化”、“异化”原文等三个方面,其中,“丑化”(中文)原文为最常见,“美化”原文极为罕见,“异化”情形则时有出现。蒋博士指出,为了反制西方汉学领域的“东方主义”传统,东方学者开始提出自己的评价途径,即“东方人的‘东方主义’”,为世人提出认识东方文化,乃至东方人的新的、正确的视角和手段。

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个性—道德—容错率：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

三大制约因素》一文中指出,迄今为止国际和国内翻译界忽视了从个性、道德和容错率三个方面论述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产生发展过程中的制约性原理。所谓个性制约因素,指的是翻译理论家和翻译批评家的性格、个性或者说气质之类对他们的理论倾向、理论接受、理论建构及批评取向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所谓翻译批评家的道德制约因素指的是由于翻译批评家手里握着褒贬的批评武器,可以使人荣,亦可使人辱,因此,翻译批评家本人的道德水平实在至关重要。所谓翻译容错率指的是可容许翻译作品和翻译理论概念发生错误的限度或临界度。容错率是一个常用的概念,是一个衡量错误或误差的容忍程度的指标。辜教授提出,我们必须容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犯错误,不能求全责备。但我们同时要求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把其错误尽量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或最合情理的程度,即错误量或错误比例应该是在可容忍的限度内。这样的可容忍的限度或比例我们称之为翻译容错率。依据这个基本概念,并且依据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原理,辜教授建构了一个翻译容错率批评标准多元互补系统。

三、译事新进展

包括翻译教学、翻译教育、翻译事务等在内的翻译活动,在“两岸四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翻译界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

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以翻译专业博士生培养工作为例,说明学术规范与创新的关系,通过提出一系列新的理念和方法,解决目前学术界若干混乱的认识。他总结出博士培养的过程和问题包括以下四点:(1)考博是发现和培养人才的过程,注意发现考生的知识优势和优势课题的潜能。(2)博士课的讲授要有魅力,注意培养学生的理论性/批判性与想像力/直觉能力。(3)论文选题的要点是创新思维的形成过程:在熟悉的领域里深挖未知并作窄而深的分析;在交汇地带穿梭往行形成跨学科创新的交互视野;或在理论的制高点上俯瞰天地进行批判性思维。(4)最后,论文答辩意味着对专门研究领域的扩展与加深,以及相关问题的明晰化和方法的反思。其问题包括在主题的核心地带唱出最强音,在边界地带讨论是与非,在结构的节骨眼上往复追溯,以考察学生的思维、写作和创新能力。王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是一致的。创新是规范基础上的创新,规范是学术创新的保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教授讨论了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她

认为,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是相互依存、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她还阐述了本科翻译课程设置的意义,强调了各种教育机构对翻译教学的指导作用。

清华大学罗立胜教授的发言是关于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翻译教学问题。他通过调查发现,“公外”研究生数量大,对翻译课的需求旺盛,但师资配备较少,适用教材不多,对这方面教学的重视也不够。罗教授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呼吁翻译界能投入更多的关注。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彭辉荣教授探讨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口译训练模式,强调对拉丁语和文学的重视。研究表明,当时的口译训练以文史哲学为素材,重视语言的文化本质训练;今日口译教师并不重视文化内涵的训练,而以“专业领域”为开课重点。这与今日以实用为主的口译教学的理念完全不同。从教材看问题,今昔相较,大相径庭;是否更具功效,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

澳门大学张美芳教授以其翻译教学的个案研究为例,在某种程度上再一次验证了功能主义模型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

台湾辅仁大学胡功泽教授总结了历来翻译文本分类的模式,针对过往的研究中没有先讨论文本分类的标准何在,提出了以翻译实践为导向的文本分类法,这种分类方法对翻译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清华大学穆凤良博士谈论了思维套路研究对英汉笔译的启示。翻译教学实践表明,学生对套路和口诀的接受快于对抽象理论的接受。

苏州大学王宏教授以实例探讨了某些句子是 Chinglish 还是英美人士广泛使用的英语的问题。他认为,从母语到外语的切换,应该是外语学习的必经之路,汉语也一样能为国际通用的英语作出贡献。讨论中,与会者也有认同。真正的中国文化“符号”(如“阴阳”、“道”等)进入英语,那是没有办法用英语中任何概念和术语来代替的,而很多还未进行过跨文化转换的汉语表达方式和思想,在翻译中也一样没有办法拿任何现有的英语用法来衡量。所谓“纯粹的英语”是不存在的。因而,应该允许或支持翻译和外语学习中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综述者认为,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Chinglish 的研究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字幕翻译是高效应和高趣味性的翻译教学工具。除了教授翻译技巧之外,字幕翻译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使他们更加关注和了解外地和本土语言、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另外,也可以使学生对于翻译的本质作出

思考,增加他们对翻译过程的认识。香港中文大学方梓勋教授以几部电影的字幕翻译作为例子(包括“卧虎藏龙”、*As Good As It Gets*, *Music and Lyrics* 和 *Annie Hall* 等),讨论了字幕翻译与翻译教学问题。

台湾政治大学张上冠教授以《荒诞——翻译十诫》为题,借用德里达的 *différance* 这个(非)观念,论述了翻译过程中意义是如何不可预设的,以及是如何持续处于流变之中的。

香港的周兆祥博士在《翻译的天究竟有多高?——怎样游走「所谓」及「正式的」翻译工作之间笑傲江湖》发言中,透过分析两个当代翻译的个案,反思了:(1)今时今日“所谓”翻译工作及“正式的”翻译工作之间的矛盾与互动;(2)翻译工作的本质/角色/使命/责任/地位、翻译与双语撰稿如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3)翻译工作如何在专业性、生活维度存在性、文化性、实用性之间寻找平衡;以及(4)翻译工作尊严的建立等。周博士认为,对以上四个问题进行反思并寻求答案,将有助于使翻译者游走“所谓”及“正式的”翻译工作之间而笑傲江湖。

中国科学院李亚舒教授和湖南商学院吴静霓教授合作研究了中国科学家兼翻译家叶笃庄教授三次翻译《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的艰难旅程及成功出版《全集》的严谨治学态度、人生经验、社会及学术影响。两位研究者通过对翻译家的研究,提出了在翻译学术上启发人们增强对翻译研究范式——进化论范式的思考。

南开大学朱琳博士对中国翻译史上几次翻译高潮时的一些翻译情况包括翻译观念、翻译选择、翻译政策、译者努力、翻译文本特点、翻译效果等进行分析,以历史的视角对翻译规范的运作特点进行了探讨,她总结了翻译规范的历史运作规律,并以之为指导,对新世纪的翻译活动的发展和规范运作进行比较科学的预测。

在文学翻译研讨分会中,香港理工大学朱志瑜教授在《文学翻译的形式》的发言中指出,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学的民族性越来越显著。如何体现各文学的民族特点成了翻译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朱教授根据功能主义的原理,讨论了文学性、形式翻译的可能性、追求美学效果的谬误等问题。他的结论是,在翻译中追求一种超文化的美学价值是徒劳的。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传达原文的美学价值的话,提倡所谓“神似”、“化境”等只能越走越远。

澳门理工学院李丽博士探讨了鲁迅儿童文学译作中的欧化现象。她发现从整体上看,鲁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后期作品的欧化现象不像